

文化書評

邢福增、梁家麟著：《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x + 262 頁。

Ying Fuk-tsang & Leung Ka-lun,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in 1950s*, 1996, x + 262pp.

說「不！」往往需要勇氣；在現代社會，尤其如此。且不說全權和集權社會中權勢者的「威信」，常令人不言為佳，就是在所謂的民主社會，大眾傳媒的鋪天蓋地，功利主義的無孔不入，個人比比皆是，熙熙攘攘，不為名來，則為利往，獨具個性者卻像稀有動物，芳容難睹。面對「碧海青天夜夜心」，「應悔偷靈藥」的，只是詩人擬想的月宮「嫦娥」，人間「宮女」，恆思「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這是仰望人須付的定金，還不是到那日的最後清算。按理說，百姓對「苛政猛於虎」深惡痛絕，怎捨得送自家「閨女」去「伴君如伴虎」？合理的解釋或許是：人生幾何？對酒當歌！捨異趨同，希冀善果。從基督信仰角度來看，這種希冀乃自取惡果的前因，如此趨同實即按神形象被造者自我異化的開端。主的福音有個重要方面，仍是當今基督門徒應格外記取的：「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太五37上），免得「落在審判之下」（雅五12下）。因此，趙紫宸（本文提及前人今人，一概直書姓名，不加稱呼，以省篇幅）當年對「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的預感，似乎不幸而言中。筆者讀完這本《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首先浮上腦際的就是“Mut Nein Zu Sagen”（說「不！」的勇氣）。

據本書序言（viii），筆者有篇文章似乎「歪打正著」地啟發了作者對此課題的研究，書中甚或對筆者一言以蔽之：「至於另一位前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張賢勇，也與丁光訓等有相同的看法」（頁216），害得本人像古代笑話中那位押解犯人的禁卒，一覺醒來，摸著被人剃成的光頭，看著身上囚服，大驚失色：「賊還在，可我呢？」然而，本書的觀點、立場及研究方法，都是不容置疑地清楚。全書除「系列說明」、「序言」（此文極精彩，可圈可點者甚多）和書末兩個附件外，主要由兩篇論文構成，即邢福增著「三自愛國運動的起源與發展

(1949~1957)」（頁1~124）和梁家麟著「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不同詮釋」（頁125~242）。前者多據所掌握的史實直書，顯然易為功；而後者得衡量諸家格格不入的主觀論斷，並設法提供後來居上卻又不偏不倚的重新詮釋，不但吃力，更難討好。或許在此意義上，更值得佩服的倒是後者，因為在作者心目中，可能根本沒有討好任何人的意思（參見頁ix），而是充滿「說不的勇氣」。但在這兩篇論文中，筆者較偏愛前者，雖然後者的才氣或更橫溢。下面據本人的閱讀感想，來探討《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一書三個特色。

一、微觀與宏觀

邢福增文開宗明義，標示出研究取向上希望整合宏觀與微觀兩方面的視角，因為這「無疑是個較為持平的切入點與取向，既著重宏觀歷史發展的制約因素，也顧及行動者的不同考慮與選擇」（頁4~5）。作為理論，這種整合的提出不必等到鄒讜教授的大作問世，因為西方史學界幾十年來對微觀史學和宏觀史學的說法已耳熟能詳。筆者數年前在 *PTCA Bulletin* 介紹《四川基督教》一書時，亦認定微觀史學的重要性；但是在本書的用法中，微觀與宏觀未與史學掛鉤，而只是作為研究取向來分別觀照行動與歷史。這是應當首先說明的。

在應用上，本書似乎都以「全能主義」的政治形態，作為五十年代大陸基督教三自運動展開的背景和制約因素。應該承認，這種認識的確很有見地；可是如果進一步追問：「這種政治形態（無論稱之為集權或極權、全權或全能，甚至別的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在中共領導人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我們立時會面對一種悖論：有意栽花花不發，否定了行動者的考慮與選擇的有效性；而無心插柳柳成行，同樣取消了行動者的責任與功過。本書所抵制的「陰謀論」，因而被釜底抽薪，或可改稱「集體無意識」！

就韓戰爆發後中美關係的全面惡化而言，本書的論述（頁51~4）基本上是切中要害的。近些年來大陸史學界對中蘇黨政要人的深入研究，已將昔日牢不可破的中蘇友誼的神話戳穿；但中共領袖對援朝抗美，事先的消極及事後的悔意，以及蘇共的頤指氣使和背後操縱，似乎尚未引起海外一般學者的足夠重視。此外，1950年下半年大陸鎮反運動中暴力鬥爭升級，最初與韓戰倒無多大關係，而是與同年上半年「蔣匪」飛機來大陸，對滬穗等地數次狂轟濫炸很有關係（參見頁52，注109）。中國出兵朝鮮半島，打了場曠日持久沒有凱旋的戰爭；美國及其他在聯合國旗幟下作戰的國家自然也無好處可撈；莫斯科因此在北京心目中的

威信又降了一格；台灣當局或許是惟一得利者。這種天下大勢，也確實影響到中國大陸，包括宗教生活在內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宏觀制約性正體現在這裏。

從微觀方面來看，本書也有值得稱道之處，比如分辨吳耀宗與協進會間的分歧（頁41以下）。對大陸的研究者而言，這種分歧及隨之而來的基督教內部的權力鬥爭，常感諱莫如深；而海外研究三自運動的人，又往往容易將當時的中國基督教領袖群體看作鐵板一塊，最明顯的是將三自運動看成吳耀宗隻手興起的波瀾。本書揭示出協進會扮演的角色，雖只是粗線條的勾勒，已足可發人深思。

二、延續與斷絕

在評價五十年代三自運動時，本書用來衡量是非（而不僅僅是功過）的尺度，是「對傳統的延繼與割斷」（頁186以下）。這裏所指的傳統，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五十年代以前，基督教歷史上「三自」的主張及實踐；其二是五十年代以來，三自運動在中國大陸基督教中逐漸形成的傳承體系。關於前者，邢福增指出：「任何人企圖將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詮釋成為承繼二十年代的本色化運動的做法（即所謂『正統論』），顯然是嚴重扭曲了當年吳耀宗的『理想』，也無視了五十年代全能政治發展的事實。」（頁121）梁家麟在大段引用了吳耀宗1950年〈展開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旗幟〉的有關文字之後，也強調：「總而言之，從歷史的角度追溯，三自運動是『作為中國基督教反帝愛國運動提出來的』，因此『反帝愛國的道路』才是其根本性的目標與工作方針」（頁212），所以作者認為「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的真正訴求，是反帝國主義而非三自本身」。由此表明了三自運動與本色化教會運動間的延續關係屬無稽之談，更「說明丁光訓等在八十年代的歷史詮釋並不符合歷史事實」（頁230）。

關於後者，梁家麟分析了大陸八十年代以來基督教「兩會」間衝突的必然性，進而指出：「三自與基協的矛盾，正好反映出今天的中國兩會對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的歷史傳統的延繼與割斷的矛盾」（頁189），而且「我們可以預見這個歷史傳統將會愈來愈成為一個歷史的包袱，妨礙兩會因應未來教會內在外在的需要，而作出有效的調節與發展。」（頁190）作者還稱，對於丁光訓等「要擺脫五十年代的觀點來為『三自』注入新的目標和方向（由政治性轉至教會性）」，表示「由衷地歡迎，並予以迫切期望」，因這「意味著三自運動對其繼承的歷史傳統的一個超越（要是非『否定』的話）的轉向。而我相信，這對中國

教會未來的發展肯定是既必要又正確的。」(頁217)可是,否定也好,超越也罷,這裏同樣需要說不的勇氣。

作者作為歷史學家,對兩個割斷褒貶分明,否定前一個延續,歡呼後一種割裂,實在意味深長。只是不知道丁光訓等人讀後,會作如何感想。五十年代三自運動與歷史傳統間的關係,其實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要錯綜複雜些,單一視角未必能睹盡芳菲。關於三自運動風起萍末,「吹皺一池春水」時的消息和景致,筆者另有文章探討,這篇書評中暫可不論。

三、國人與外人

吾鄉先賢有句口號:「實事求是,莫作調人」,此言對治史者尤為重要。讀本書,常覺可喜的是作者對他人的著作,無論出自國人或外人,都能以平等心待之,這在梁家麟文中尤其明顯。比如對魏克利《求同存異》中的論述,本書有讚之「一針見血」的(頁238,注23),有對之抱存疑態度的(頁216,注176),更有施以委婉批評的(如頁178,注99)。作者承認,魏克利此書「為五十年代三自運動,作了最全面周詳的辯護」,因而在第三章中專門用了一節的篇幅,來檢討「魏克利的三自說辯」(頁165),「但由於作者不僅完全認同三自教會及其領袖的思想和路線,從善意的角度解釋並合理化其所作所為;甚至將一切中共政府以至三自運動發布的官方文件與言論,不作任何鑑證而盡假設其為事實,並以之作為詮釋歷史的根據,所以筆者甚難接納書中的許多觀點,僅將之視為一個三自運動對其自身歷史的官方說辯」(頁128,注1)。我相信,讀過魏克利此書的人,不少會像梁家麟一樣,在許多觀點上存異,但將此書視為三自運動的官方說辯者,為數卻不會多;因為魏克利一沒在大陸基督教「兩會」中任職,二也不是中國政府的官方喉舌(如新華社香港分社)之代言人。或許他有心拜塵攀緣,但至少目前他的身分不過是 NGO 的愛德基金會海外聯絡員,所扮角色無外乎國外友人的代表和親華的消息靈通人士,並不帶有官方色彩,仍值得我們珍視。

當然,作者對外人著作的批評並不僅僅限於魏克利《求同存異》一書,對鮑伯·懷特《相交未了》的指斥更形嚴厲:「值得一提的是,懷特(Bob Whyte)的這本書是筆者接觸過有關對中國當代教會歷史的論述裏,對三自作出最全盤肯定的一種」,其中有些說法「較極左時期的中共宣傳還要極端」,「實在令人掩卷慨歎」(頁163-164,注71)。國人是不是就不如此極端呢?似乎沒有這麼幸運的事,作者的矛頭馬上就指向「評價也大抵雷同」的盧昭靈(頁164)。

由此可見，作者對國人外人並無偏袒，所下的批評也基本依據他對各人著作內容的了解，沒有失之過分偏頗，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

外人關於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著述中，實事求是的議論其實為數不少。筆者很佩服像喬治·胡德那樣的著作（本書中多次徵引，如頁21、131、194、206、226、228及231等處），嚴謹而力求公正，顯示出作者良好的史學素養。僅讀過漢學或神學的外人著作，在論及同一主題時，不免相形失色。

就歷史研究而論，國人一般在微觀切入方面容易發揮優勢，外人在宏觀背景把握方面比較擅長。取長補短，是學術進展的階梯，但前提則是知道人之長並己之短。本書的兩位作者，既樂意示人之長，又不懼揭人之短，至少對人之長短並不盲目，這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

作為書評撰寫者，我希望讀者早晚有披閱原書的機會，因為書評的職責好比昔時媒婆，是要撮成讀者與所評著作間的好事，斷無撇下女方，同男方私奔暗結秦晉之好去的道理；至於專挑原書的錯，存心一棍子打死的行徑，既未敬業，又傷厚道，可作例外存而不論。此外，按現代書評的通則，書評作者沒有將原書內容詳細糾給讀者的義務；相反，英國現代文學史上某男性作家，為人促狹，常以書評為由專事「拆白」女性作家的偵探小說，至今仍招人詬罵。易將書評寫成原書內容提要的作者，可不慎乎？

本書作為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文化集刊」第一種，實為良好的開端，雖說此書本身還帶有「半成品」的性質（參見頁45，注92及頁157，注60）；筆者評論此書，也屬意外。據我所知，存世者中對大陸五十年代基督教三自運動內幕及真相最為了解的，除當時一些高層的宗教幹部外，還包括若干位先「宗」教後「干」部者。此外，像滬上離休的羅竹風、寓京的陳文潤、旅美的趙復三，也都可謂知情者。至於基督教「兩會」要員中，沈德溶、羅冠宗、丁光訓都可算「曾經滄海難為水」，事已經過深知難的人；他們有時即使願意披露些「是是」的真相（更需勇氣的「非非」暫且不論），怎奈會被有心的聽眾化解為紅樓人物的妙語——假作真時真亦假！有個信任危機的問題。筆者前期發表的〈「三自」探源〉，原為多年前在芝加哥石哲明（James A. Scherer）教授宣教學研討班上提交的學期論文，這次發表，內容一律未作增改，儘管標題自改一次，編輯又據我校正的漢語題目替我擅改一次。

若說賈玉銘牧師得「源頭不濁」四字「就決心擁護『三自』」（丁光訓著：《聖靈和我們》），是愛神的僕人對神的啟示應有的態度；那麼探究人世間歷史

運動源頭清濁的真實依據，也是後來治史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三自』探源」側重的是三自「觀念」的形成史，而非三自「運動」發展史，因此作為流緒的大陸五十年代三自運動，只在文章第四部分第四節論及，雖然結論部分在八十年代末更帶有前瞻的意味。現在邢、梁二位合作的這本專著，塞源截流，展示的是出山溪水匯成波濤的圖景，提醒讀者對清流，抑或濁流作涇渭分明的評價時格外小心，其功自不可沒。筆者得緣評介此書，也覺榮幸。知我罪我，其惟作者與讀者乎？

張賢勇
瑞士巴塞爾大學